

# 工作流动：理论综述与评价

张珂 杨伟国

**【摘要】** 文章研究的是劳动经济学领域内的工作流动问题。全文主要采用文献综述的方法,意在以西方学者在本领域内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对有关工作流动现象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进行全面介绍,并就其理论意义和缺陷给予评价。

**【关键词】** 工作流动 工作创造 工作消亡 工作再配置 超额再配置

**【作者】** 张珂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研究生;杨伟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企业经营模式的大规模转型以及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中国劳动力市场发生了剧烈的变革,大批的传统工作岗位逐渐衰落甚至消失,新生的工作岗位不断涌现出来。无疑,这种变革给整个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具体到劳动力身上,当企业创建或破产、企业规模扩大或缩小、旧的技术被淘汰而新的技术出现时,员工们总会受到或大或小的影响。一些员工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获得了更好的发展机会,另一些员工被迫接受培训以更新技能,还有一些员工不得不更换工作岗位,有的索性退出劳动力市场。

事实上,在对劳动力市场进行研究时,我们无法否认的一点是:劳动力在很多情况下只能是流动的被动承受者,会因为行业、企业和工作岗位自身的变化而受到牵连;同时,与单纯的劳动力流动相比,工作岗位的变动已经成为劳动力市场上最主要的波动形式之一,并对人们的经济和生活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这种变动(我们称之为工作流动)实际上是劳动力之所以发生流动的一个重要原因,它的任何一点波动都会在劳动者身上几倍、几十倍的放大。因此,对工作流动现象进行研究会帮助我们从根本上更为透彻地认识劳动力市场,并使得对它的全方位把握成为可能。

尽管劳动经济学者在很早就已经开始关注劳动力市场的工作流动问题(伊兰伯格和史密斯,1999:309),但把它上升到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的高度只是最近十多年的事情。目前,在工作流动理论体系的构建方面,西方学者已经取得了初步进展。他们把工作流动定义为由于种种原因所导致的工作岗位的产生和消亡现象,研究了各种因素对其产生的影响,以及它对整个劳动力市场起到的作用。一般来说,这些研究大多是从经济理论、劳动经济、产业经济相结合的角度来认识问题,构建了严谨而规范的理论模型,并积累了丰富的数据和事实。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已经自成体系,对整个学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然而,在中国尚属空白。

## 一、工作流动的概念和测量

当前,工作流动研究领域的概念都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上:特定行业里工作岗位的变化可以用雇用量的变化反映出来。这些概念包括:工作流动、工作创造、工作消亡、工作再配置、超额再配置等,正是它们构成了整个工作流动理论的基础。在这些概念里面,工作流动是最宏观的概念,它指的是由

于种种原因导致的工作岗位的产生和消亡现象。具体到其他概念,工作创造和工作消亡是在表层从量的方面衡量工作流动的大小和方向,二者描述的是两种方向相逆的运动;而工作再配置和超额再配置则是从质的层面综合分析了员工、工作、生产资料在不同雇主间的重新分配,它们是衡量不同企业之间雇用量变化差异的有效途径之一。这几个概念贯穿于整个研究的始终,因而显得相当重要。

这里,如果以  $EMP_{est}$  表示部门  $S$  中的雇主  $e$  在时点  $t$  雇用的员工人数,以  $S_t$  表示时点  $t-1$  到时点  $t$  时段内具有正雇用量的雇主集合,用  $S_t^+$  表示该时段内新近进入或规模扩张的雇主子集,以  $S_t^-$  表示同一时段内规模收缩或退出的雇主子集,则上面提到的有关概念的文字表达和公式表达分别为(Haltiwanger等,1999): (1) 工作创造:时点  $t$  的工作创造量等于从时点  $t-1$  到时点  $t$  这一时段内新近开业或规模扩张的所有商业单位中雇用量的总体增加,  $C_{st} = \sum \Delta EMP_{est}$ 。(2) 工作消亡:时点  $t$  的工作消亡量等于从时点  $t-1$  到时点  $t$  这一时段内规模收缩或倒闭的所有商业单位中雇用量总体上的减少,  $D_{st} = \sum \Delta |EMP_{est}|$ 。(3) 工作再配置:时点  $t$  的工作再配置等于从时点  $t-1$  到时点  $t$  这一时段内特定行业中所有商业单位雇用量增加和减少的绝对值之和,  $R_{st} = \sum |\Delta EMP_{est}| = C_{st} + D_{st}$ 。(4) 超额再配置:时点  $t$  的超额再配置等于从时点  $t-1$  到时点  $t$  这一时段内总工作再配置减去净雇用量变化的绝对值,  $R_{st} - |NET_{st}| = (\sum |NET_{st}| - |NET_{t-1}|) + \sum (R_{st} - |NET_{st}|)$ 。其中,前一部分表示不同部门间的超额再配置,后一部分表示同一部门内的超额再配置;当所有部门雇用量变化方向相同时,第一部分数值为零,因此,超额再配置可以被看成是可以有效衡量同时发生的工作创造和工作消亡的一个指标。为了把上面这些工作流动的度量值换算成比率,可以用它们除以雇用规模。用时点  $t-1$  到时点  $t$  时段内的雇用量平均值:  $Z_{est} = 0.5(EMP_{est} + EMP_{est-1})$  表示雇用规模,则部门  $S$  内的单位  $e$  在时点  $t$  的雇用增长率可以表示为:  $g_{est} = \Delta EMP_{est} / Z_{est}$ ,而部门  $S$  在时点  $t$  的雇用增长率可以表示为:  $g_{st} = \Delta EMP_{st} / Z_{st}$ ,采用这种方法,部门  $S$  的工作创造、工作消亡、工作再配置的比率可以分别表示为:  $c_{st} = C_{st} / Z_{st} = \sum (Z_{est} / Z_{st}) g_{est}$ ;  $d_{st} = D_{st} / Z_{st} = \sum (Z_{est} / Z_{st}) |g_{est}|$ ;  $r_{st} = \sum (Z_{est} / Z_{st}) |g_{est}| = c_{st} + d_{st}$ 。(5) 员工再配置:时点  $t$  的员工再配置等于从时点  $t-1$  到时点  $t$  这一时段内变更雇用地点或雇用状况的总人口数。

## 二、工作流动的重要理论

已有研究表明,工作流动现象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sup>①</sup>之间广泛存在,同时工作创造和工作消亡的速度是相当快的。针对美国经济进行的研究表明,一年里,每10个工作岗位当中就有1个工作岗位消失,同时产生1个新的工作岗位(Haltiwanger等,1999)。具体到制造业,行业中工作创造和工作消亡的年度规模分别达到了9.2%和11.3%(Davis等,1992)。在这种高频率的工作流动中,很大一部分是工作的额外再配置。从时间维度上看,暂时性行为所占的比例非常大,在季节性的流动中更是这样。同时,生产单位内部的工作流动频率要高于生产单位之间;在不同行业中,非制造业的工作流动频率要高于制造业;不同产业相比较,私有产业的流动频率往往是最高的。

为了证明和应用上述观点,学者们建立了若干经济理论模型。受当前劳动经济学发展趋势的影响,这些理论大多应用了新古典经济学中一些较为常见的数学工具,以期把经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

### (一) 异质性理论

异质性理论建立在如下假设之上:工作流动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若干特质因素的影响;取决于这些因素的差异,雇主经历的工作流动的规模和强度也会呈现很大差异。目前,这一方面的研究以经验研究居多,但也不乏规范模型;受学科性质的影响,从微观方面对于雇主特征进行的异质性研究更

① 现有相关研究已经覆盖了包括美国、法国、俄罗斯、芬兰、西班牙、中国台湾省、意大利、加拿大、以色列、波兰、斯洛文尼亚等诸多国家和地区。

为详尽一些。在一定意义上,这一理论可以被看成是经济学者研究工作流动现象的开始。它首先站在了与劳动力流动理论相对应的立场上,探讨雇员自身特征之外对劳动力流动和工作流动发生影响的一些微观因素,为以后的研究打开了局面。

1. 表现于雇主特征之上的异质性。一般认为,雇主的很多特征都会影响到他所面临的工作流动的规模和性质。这些因素包括:其所在行业、产业、地域、经营规模、经营年限、产品细分程度等。通常情况下,在其他因素都保持恒定时,企业经营规模越大,业绩增长越快,工作再配置的规模和强度就会越大;同时,工作岗位的超额再配置频率也随雇主雇用规模和经营年限的增加而增加,随员工薪酬水平的上升而下降。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有数据表明,相当一部分的工作流动都集中在那些正经历高速收缩或扩张的少数生产单位中。例如,对美国制造业部门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2/3以上的工作消亡都发生在那些一年里规模收缩幅度在25%以上的组织中;而工作消亡往往也都由那些对于失业已习以为常的特定员工承担;同时,刚刚开业和完全停产的组织所对应的工作创造和工作消亡在总量中占据了相当高的比例(Haltiwanger等,1999)。戴维斯(Davis)和豪特威尔(Haltiwanger)利用美国劳工调查局统计数据中1978、1983和1986年度美国一些工厂的数据。通过控制一些因素(如年份、国别、年限、规模、员工薪酬等),对净雇用增长量和它的绝对值进行了回归,从而得到了特定行业的超额配置率(预期的绝对增长率和净增长率之间的差值)。为了了解各因素对超额配置率的边际净影响,在研究过程中,他们通常都是使其他因素保持中值。通过这种方法,建立了若干因素与工作流动之间的关系模式(Orley等,1997)。

2. 企业层面上的异质性。显然,雇主特征只是影响工作流动现象的部分因素,经济学家们的阐述远不止于此。他们认为,企业层面上的一些特质因素同样影响了工作流动的规模和性质,这些因素包括新产品和新的生产技术的开发、推广、应用、营销以及管理规范上的不确定性;厂方的经营和管理能力;对生存环境的学习和适应能力;工厂、公司独特的环境分布;有关技术、推广渠道、营销渠道、消费者品位等信息的获得;资本的收益等。值得一提的是,与一般的经济学研究不同,对工作流动现象的研究还关注一些非市场因素的影响。例如,在企业层面,有研究指出,员工发言机制(如工会)的存在对劳动力流动有很大影响,但与总工作流动没有什么明显关系(Carlos等,2002)。

3. 行业和国别不同带来的异质性。对行业因素与工作流动之间关系进行的研究表明,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产品细分程度,这会影响到工作再配置的密度和规模;行业间引起再配置的外力的作用强度是不同的(行业不同,其所面临的技术变化的速度、旧产品被淘汰的速度也不同)。有研究表明,行业的生产率增长越快,它的工作再配置比例就越高。而针对国别因素进行的经验研究表明,不同国家间,指导工作流动的政策因素不同是国别差别的决定性因素(Orley等,1997)。有学者指出,许多西欧国家之所以出现了极高的工作再配置比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为补偿工作的安全性而提出的许多压低薪酬政策所发挥的影响;同时,货币政策的松紧对于工作创造和工作消亡亦有影响,即宽松的货币政策往往不利于鼓励工作创造,较紧的货币政策则能够增加工作消亡的幅度,并减少净雇用量的变化(Pietro,1997)。

## (二) 劳动力流动与工作流动关系理论

工作流动行为对于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例如,有台湾学者对本土和全球工作流动行为进行的研究显示,信息产业的发展带来的工作流动导致了台湾制造业就业机会的减少和专业服务产业的成长,并催生了所谓的“知识工作形态”;就国际市场而言,工作流动行为主要表现为低技术水准的职业渐渐由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使得发展中国家变成提供“低技术劳力密集服务”的出口商,而发达国家则专门从事技术密集活动(Haltiwanger,1999)。

事实上,工作流动是劳动力之所以发生流动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特定年份里,美国劳动力市场上1/3到1/2的劳动力流动都可以用工作流动加以解释。在现有的关于二者关系的研究中,较为普遍接

受的是安德森(Anderson,1994)和麦亚(Mayer,1996)等人分别进行的两项研究都是建立在美国保险事业系统的权威资料之上,通过研究雇用量和雇用组合的季度变化来衡量员工流动和工作流动,并计算劳动力的总体流动中由工作创造和工作消亡引起的那一部分所占的比例,简称为“创造—增加、消亡—减少”(Orely等,1997)。在前一项研究中,学者们考虑到了员工在季度内的短期“离业”,但没有考虑到离业后可能重新被召回;因此,其研究只考虑了员工流动方面的短期波动,但忽略了工作流动的短期波动因素,这就使得“创造—增加、消亡—减少”比例数值偏低,充当了衡量结果的下限。而在后一研究中,研究者研究的则是与“满季度员工”<sup>①</sup>相对应的员工流动和工作流动。显然,这一研究把短期的员工和工作流动排除在外。而事实上,考虑到许多新建立的雇佣关系初期分离的可能性很大,因此实际被剔除的员工流动比工作流动的比例要大。于是,这一结果事实上提供了测算比例的上限。

我们可以用具体数据来说明这两项研究存在的差别。根据麦亚等人的研究,在私有部门的制造业中,创造—增加比例为52%,消亡—减少比例为23%;而在安德森等人的研究中,这两个数据分别为50%和58%。虽然二者之间的差别较大,但两项研究都表明,员工流动受工作流动的影响相当大。美国本土的数据显示,每季度的员工流动大概相当于整个雇用量的25%;而其中由工作配置引起的占35%~40%。而且,有研究者提到,考虑到工作流动可能产生了溢出效应,实际比例会更高一些。

### (三) 工作流动与生产率增长关系理论

在经济学领域,熊彼特曾发明过一个名词“创造性的毁灭”,用以描述投入和产出在生产者间的再配置在生产率增长方面发挥的关键性作用。他这样提到,“促使资本主义这台发动机运行的基本动力来自于新的消费产品、新的运输方法、新的市场等……这一创造性的毁灭是资本主义的基本事实。”<sup>②</sup>而劳动经济学者认为,工作再配置实际上就属于这一“创造性毁灭”的范畴。

作为其中较有影响力的代表,阿宏恩(Ahion)和豪威特(Howitt)建立了这样一个模型(Orley等,1997):以 $P_{it}$ 代表行业*i*中劳动力或其他要素的生产率,以 $P_{et}$ 代表第*e*个公司或工厂的相应生产能力, $S_{et}$ 则是行业整体行为中第*e*个单位所占的产量份额,则有 $P_{it} = \sum S_{et} P_{et}$ ;同时可以把行业水平上的生产率公式分解为: $\Delta P_{it} = \sum S_{e,t-1} \Delta P_{et} + \sum (P_{e,t-1} - P_{e,t}) \sum S_{et} + \sum \Delta S_{et} \Delta P_{et} + \sum S_{et} (P_{et} - P_{e,t-1}) - \sum S_{e,t-1} (P_{e,t-1} - P_{e,t})$ 。此处, $C$ 是持续经营的工厂构成的集合, $N$ 是新进入的工厂构成的集合,而 $X$ 是新退出的工厂构成的集合。在这个公式里,第一项表示工厂内部生产率的增长量,该增长由初始份额加权得到;第二项反映的是厂间效应,该效应体现出了工厂在行业活动中份额的变化;第三项是不同产品的协方差,它反映了行业的活动份额是否在向生产率增长较快的工厂偏移;后两项则分别衡量了进入和退出的厂商所发挥的作用。

若以 $Q_{it}$ 表示总产出, $L_{it}$ 表示劳动力总投入, $K_{it}$ 表示实体资本, $M_{it}$ 表示原材料,则 $\ln MFP_{it} = \ln Q_{it} - \ln K_{it} - \alpha_L \ln L_{it} - \alpha_M \ln M_{it}$ 。当把具体的符号和数据带入这个模型后,得到的结论是,总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中,很大一部分可以反映经历了生产率增长的厂家产出份额的扩张;而工作再配置则是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要素之一。

同时,值得一提的是,涉及到工作再配置,有关工作消亡就意味着企业衰落、工作绩效变差的假设是错误的;在特定情境下,工作消亡亦有可能发挥正向作用。事实上,雇用规模缩小很多时候都会伴随着大规模的生产率增长。一些情况下,工作消亡会使得企业生产率上升很快。当然,把生产规模缩小简单等同于成功也是有失偏颇的。

### (四) 经济周期与工作流动理论

数据资料显示,工作流动随时间推移而周期性变化显著。例如,1947~1993年,在美国制造业部

① 指的是从时点*t*到时点*t+1*一直都在职的员工。

② Orley C. Ashenfelter, Richard Layard eds(1997), *Handbook of Labor Economics*, Vol. 14, North Holland.

门中,每季度工作消亡占雇用总量的比例从2.9%到10.8%不等,而工作创造的相应比例则介于3.8%~10.2%之间。同时,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工作消亡比工作创造表现出了更大的波动,平均的变动幅度要高出2~3倍(Campbell等,1997)。这种变化就使得对经济周期和工作流动二者关系的研究成为工作流动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知道,有关经济周期的既有理论大多强调总量冲击的作用,而工作流动理论则引入了配置性冲击的概念。所谓配置性冲击,是指使得不同工作场所和不同雇佣匹配的盈利状况发生特定变动的冲击。有学者指出,在经济的周期性变迁中,配置性冲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这种冲击作用在相当程度上来自于工作再配置活动(Haltiwanger等,1999)。无疑,这一概念的提出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 and 把握经济的周期变迁是十分有利的。与已有理论相比,它使得对于经济周期产生原因的分析细化,具体到了微观雇主身上;同时,由于是从动态的角度看问题,这种理论也显示出了它的先进性和科学性。

目前,这一方面的研究分为两派,尚未达成一致,其根本分歧在于,究竟是配置性的冲击导致了总量冲击,从而产生了经济周期;还是总量冲击本身导致了经济周期。事实上,我们可以认为这两种理论是互补的,前者强调指出配置性冲击改变了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生产要素的既有生产模式,从而使得经济要耗力进行调整和适应,产生了周期;后者则认为正是总量冲击导致了经济衰退中再配置行为的集中。这种看法认为,其时进行调整的机会成本较低,企业可以致力于耗资较大的再配置;同时,经济、信息环境的恶化,使得资源多通过再配置进入那些与外界环境较为独立的经济组织中;此外,由于信息获得的难度增大,也会导致工作搜寻以及其他一些行为的集中,配置性冲击的密度随之增加(Campbell等,1997)。或许,将这两方面相结合,认识到总量波动和再配置过程的紧密关系才是最重要的。

值得一提的是,布兰查德(Blanchard)和海蒙德(Hiamond)等人的研究表明,总量冲击和配置性冲击使得失业、待业、工作创造、工作消亡表现出了不同的特征,具体来说,前者使得工作创造和工作消亡沿着相反的方向变化,而后者使得二者的变化方向相同(Orely等,1997:2782~2784)。可见,若想对经济周期问题产生清楚的认识,这一领域还有待于学者们进一步探讨。

### 三、工作流动理论的意义和局限

由上面的具体论述可以发现,工作流动现象在经济生活中的广泛存在是无法否认的,而对工作流动问题进行研究是必须亦是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工作流动理论的提出和逻辑体系的构建在现代劳动经济学的发展史上是不可抹去的一页,它以自己的独到之处给这门古老的学科注入了新的活力。概括来说,该理论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它提供了研究劳动力市场上流动问题的崭新视角。正如前文所言,有的关于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往往局限于劳动力一方,把劳动力看做主动的行为者,试图通过讨论劳动力的质量、价格、人力资本储量、居住区域、性格偏好等诸多要素来寻找流动方面的普遍规律。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匹配永远是双方面的,劳动力市场上的波动不仅会表现为劳动力的流动,同样也会表现为工作岗位的流动;而且,劳动者在更多情况下都是被动的承受者。工作流动理论从工作岗位的变迁状况入手,从根源上更为透彻地分析了工作流动的决定因素、影响因素、发挥的作用以及与劳动力流动之间的关系。无疑,这是更为全面、更切实际的,同时也使得对于劳动力市场问题的全方位把握成为可能。

第二,它弥补了原有劳动力流动研究方法的局限,更多地考虑了制度性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已有的劳动经济学研究尽管涉及到不少的制度分析,但它还是更多地偏重于新古典经济学(易定红,2002),这一点在对劳动力流动的研究中尤其明显。一方面,这种传统有助于我们充分考虑市场的运行机制,运用效用最大化原则,对劳动力和市场的作用方式加以分析;另一方面,制度性因素在研究过程中则往往会被忽视。而事实上,在当今的法制社会中,只有充分考虑制度因素的作用,才算是符合事物

的全貌。但在对工作流动的研究中,这个问题则得到了避免。它将新古典研究方法和制度研究方法相结合,并给后者充分的权重,在供需平衡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了政府、政策、社会环境、福利服务等人为因素对工作流动和劳动力流动状况的影响,从而准确反映事物的全貌,并增强了学科的实用性。

第三,弥补了旧有理论的缺陷,增强了学科的科学性和说服力。旧有的劳动经济学理论存在着一些广为人知的缺陷,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学科的科学性和说服力。以经济周期理论为例,学者们倾向于采用标准的经济周期均衡模型,往往忽视了知识和偏好受到的冲击,也忽略了总体经济波动的种种长期特征。而工作流动理论则充分意识到总量冲击和配置性冲击二者间的紧密关系,不仅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了区分,还同时引入了工作再配置模型;事实上,在对经济周期问题进行探讨时,劳动力市场行为的引入是相当有利于提高经济周期模型的效果的。

第四,对中国现阶段建设有十分重大的借鉴意义。在以中国为代表的转型经济中,工作流动、工作再配置尽管从来没有被系统地提起过,但它们的确是不容忽视的特征:国有企业经营改组、私营企业规模日益壮大、新的技术和机器不断被引入生产过程,以及学者们经常提到的、独具中国特色的农民工大批涌入城市、工人经历下岗和再就业……,这一切都使得我们面临的工作结构不再是一种常态。具体到数字方面,北京地区2001年度的工作创造量为627 298个,工作消亡量为795 044个<sup>①</sup>;而根据美国学者的研究资料,曼彻斯特地区在1988~1999年的工作创造和工作消亡的总量分别是736 000和618 000个(Bradbury,1999)。两相比较,中国的工作流动规模无疑是相当大的。这种波动既给经济起飞带来了机遇,也提出了不小的挑战。我们更应该对转型经济中的工作流动、工作流动的普遍特征、工作流动与劳动力流动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在已经提出并被实践检验了的理论框架下,借鉴西方已有的理论,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利用有利的理论工具对我们的政策提供支持,争取少走弯路,稳步发展。

然而,工作流动理论作为刚刚兴起的研究领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很大的局限。

一方面,为研究条件和研究能力所限,现有的大部分研究都是以美国的劳动力市场为研究对象。这些研究虽然数据完备,具有一定的研究信度,但鉴于各国国情存在区别,所以其使用范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限制,效度无法得到保证。客观地说,这是相当不利于本学科长远发展的。

在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是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的农民工进城和工人下岗的问题。这两种工作流动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独具中国特色的。有数据显示,它们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劳动力市场上最主要的两种波动形式。如2001年北京新增加的627 298个工作岗位中,由农民工承担的占216 367个,占工作创造总量的34.49%;而在下岗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方面,具体以制造业为例,在全行业2001年度新创造的105 595个工作岗位中,由下岗工人承担的占8 882个,同时工作消亡(196 692个)也直接导致了23 636名工人失去工作<sup>②</sup>,它所产生的影响由此也就可以窥见一斑。毋庸置疑,对于中国当前的劳动力市场研究而言,对这两个方面加以侧重是甚为必要的,但西方现有的研究中给予这两方面的注意力还相当缺乏,在一定程度上尚属空白,这就有待于我们在今后的研究过程中投入更大的精力。

另一方面,从研究深度来看,目前在工作流动领域的大多数研究都还只是停留在量而非质的层面上。它们多半只是限于对数据进行简单分析,并从中提炼出一些经验性的事实和结论,很少会上升到理论和逻辑的高度;即使形成了观点,也很难保证这些观点的严谨和完备性。以工作流动中的异质性理论为例,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这一理论认为工作流动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若干特质因素的影响,并对这些因素分为雇主层面、企业层面、行业层面和国家层面。不同层面当中,雇主层面和企业层面是重点,而在行业层面上只是涉及到了产品细分程度和外力的强度(例如技术变化的速度和旧产品被淘汰的速度)。而事实上,有研究表明,取决于不同行业对人力资本储量要求的不同、雇佣双方关系

①② 根据北京市统计局2001年度劳动力调查数据计算而得。

持续性的不同以及行业发展前景的差异,特定行业所表现出来的工作流动的强度和风险也是存在很大区别的。由此可见,异质性理论远未达到完善,这也表明本领域的相关研究还是很欠成熟的。

此外,由于对工作流动问题的研究刚刚开始,理论体系远不完善,所以劳动经济学领域的许多重要问题。例如,工作搜寻、雇用匹配、失业工人的收入损失、风险分担、薪酬的确定、失业保险等都没能被涵盖进去。由于这些问题没有被深究,工作流动理论作为一个专门研究领域的完整性被削弱,它对于实际应用的价值也无法得到充分发挥。即便如此,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工作流动理论已经显示了它极大的应用价值。

#### 参考文献:

1. 伊兰伯格和史密斯(1999):《现代劳动经济学——理论与公共政策》,刘昕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 易定红(2002):《西方劳动经济学两大流派的比较》,《劳动经济与劳动关系》,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3. Bradbury, Katherine L(2002), Job Creation and Destruction in Massachusetts: Gross Flows Among Industries. *New England Economic Review*, 00284726, Sep/Oct.
4. Campbell, Jeffrey R., Fisher, Jonas D.M. (1997), Understanding Aggregate Job Flows. *Economic Perspectives*, 1048115X, Sep/Oct, Vol. 21, Issue 5.
5. Carlos Garcia-Serrano, Miguel A Malo(2002), Worker Turnover, Job Turnover and Collective Bargaining in Spain. *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London, Mar.
6. Davis Steven J., Haltiwanger John(1992), Gross Job Creation, Gross Job Destruction, and Employment Reallocation.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Cambridge, Aug.
7. Fabrice Collard Patrick Feve, Francois Langot, Corinne Perraudin(2002), A Structural Model of US Aggregate Job Flows.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ics*, Chichester, May/June.
8. Haltiwanger, John C., Schuh Scott(1999), Gross Job Flows between Plants and Industries. *New England Economic Review*, 00284726, Mar/Apr.
9. John M Abowd, Patrick Corbel, Francis Kramarz(1999), The Entry and Exit of Workers and the Growth of Employment: an Analysis of French Establishments.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Cambridge, May.
10. May C. (2000), Information Society, Task Mobility and the End of Work. *Future*, 32(5), Jun.
11. Orley C. Ashenfelter, Richard Layard eds(1997), *Handbook of Labor Economics*, Vol. 14, North Holland.
12. Pietro Garibaldi(1997), The Asymmetric Effects of Monetary Policy on Job Creation and Destructi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ec.
13. R Jason Faberman(2001), Job Creation and Destruction Within Washington and Baltimore. *Monthly Labor Review*, Washington, Sep.
14. Satu Hothi(2000), Job Flows and Job Quality by Establishment Size in the Finnish Manufacturing Sector 1980-84.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Dordrecht, Dec.

(责任编辑: 朱 犁)